

中国

1840-1919

近代文学大系

ZHONGGUO
JINDAI
WENXUE
DAXI

史料索引集

· 1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集·Ⅰ·

29

In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A TREASU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WELFTH DIVISION,

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2 VOLUMES, NO. 1

SHANGHAI BOOK STORE

Shanghai, China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12集·第29卷·史料索引集

魏绍昌 主编

上海书店 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嘉兴市新嘉印刷厂排版

亭林印刷厂印订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50 插页 4 字数 350 千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ISBN 80569-779-5/I·226

定价(精) 90.00 元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史料索引集 1

主 编 魏绍昌

副主编 钟贤培 祝均宙

袁凯声 裴效维

上海书店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各分集主编

文学理论集	徐中玉	俗文学集	范伯群
小说集	吴组缃		金 名
	端木蕻良	民间文学集	钟敬文
	时 萌	书信日记集	郑逸梅
散文集	任访秋		陈左高
诗词集	钱仲联	少数民族文学集	马学良
戏剧集	张 庚	翻译文学集	施蛰存
笔记文学集	柯 灵	史料索引集	魏绍昌
	张海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室成员：范 泉(总) 王知伊 周 劭 杨友仁

龚建星 郑晓方

装帧设计：范一辛

本卷责任编辑：龚建星 徐力励



《瀛寰琐记》是中国第一本文学期刊



近代文学期刊一瞥



近代文学期刊一瞥





南社临时雅集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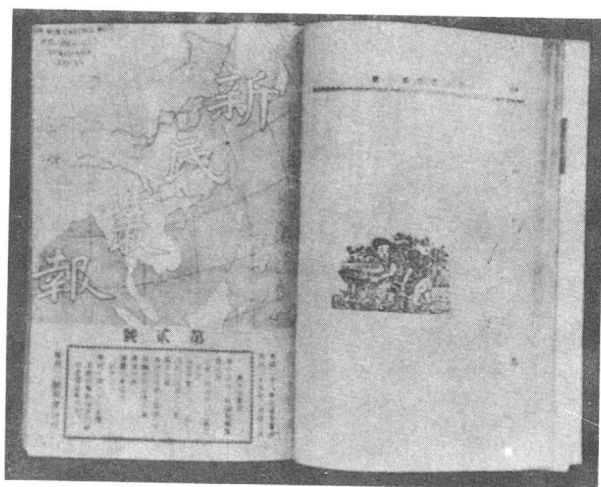


近代文学期刊一瞥



桐城——湘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

鸳鸯蝴蝶派创作小说《广陵潮》书影



“新民体”文章发端于《新民丛报》

出版说明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清王朝腐朽崩溃、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反映在文学上，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反映现实社会、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语合一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隐显错杂、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笺释，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上海書店

1990年10月

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

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 | | | | |
|----|--|----|-------------|
| 1 | 文学理论集: | 两卷 | 第一卷、第二卷 |
| |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 2 Volumes, Nos 1—2 | | |
| 2 | 小说集: | 七卷 | 第三卷至第九卷 |
| | Novels, 7 Volumes, Nos 3—9 | | |
| 3 | 散文集: | 四卷 |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 |
| | Prose Writings, 4 Volumes, Nos 10—13 | | |
| 4 | 诗词集: | 两卷 | 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
| | Poetry, 2 Volumes, Nos 14—15 | | |
| 5 | 戏剧集: | 两卷 | 第十六卷、第十七卷 |
| | Drama, 2 Volumes, Nos 16—17 | | |
| 6 | 笔记文学集: | 两卷 | 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
| | Literary Notes, 2 Volumes, Nos 18—19 | | |
| 7 | 俗文学集: | 两卷 | 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 |
| | Popular Literature, 2 Volumes, Nos 20—21 | | |
| 8 | 民间文学集: | 一卷 | 第二十二卷 |
| | Folk Literature, 1 Volume, No 22 | | |
| 9 | 书信日记集: | 两卷 | 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 |
| | Letters and Journals, 2 Volumes, Nos 23—24 | | |
| 10 | 少数民族文学集: | 一卷 | 第二十五卷 |
| |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1 Volume, No 25 | | |
| 11 | 翻译文学集: | 三卷 |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 |
| | Translated Literature, 3 Volumes, Nos 26—28 | | |
| 12 | 史料索引集: | 两卷 | 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 |
| | 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2 Volumes, Nos 29—30 | | |

导 言

魏紹昌

—

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二千年来一直闭关自大的封建帝国,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剧烈变动的一页。随后的甲午战争,又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不可救药。面临着列强的欺压,中国各方面的志士仁人,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莫不殚精竭虑,力图救亡自存,探索富国强民之道。可是,随着经济侵略引进的资本主义,由于先天不足,软弱无力,呈现着畸形之态;随着文化侵略传入的先进西学,拿来自用,还得有一个识别、取舍、结合到融化的锻炼过程。中国的一部近代文学史,就从当初的文化现象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特征与社会性质。本世纪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化锻炼前期的历史任务,起了质的突变,达到一个崭新的更高阶段。因此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同“五四”前的八十年比较起来,尽管换了朝代,然而社会性质不变,经济基础也没有大不同,可是文化现象

已判然异样,新旧有别,文学史上势所必然的应该有近代与现代之分了。

关于研究近代文学的论文,自应以一九一九年为起点,在当年之初的《新青年》、《新潮》、《太平洋》等刊物,就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此类论文。可是全面综论近代文学的论文,则应以胡适作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最早的一篇。此后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前的三十年间,各种报刊以及单行本内发表有关近代文学的论文,据初步统计,不足一千篇,而关于小说的却占了一半以上,关于诗文、戏剧二门所占的比例极小,更何况尚有不少缺门。即使在小说一门中,讨论较多的,也只不过是几部主要小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这种不平衡性与不全面性是十分突出的。而且一般论著大都缺乏深刻独创的见解,大都局限于对作家或作品的粗浅介绍而已。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的《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三篇,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的《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这一篇,可以说是前三十年中研究近代小说丰硕的成果。胡适的几篇关于研究清末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考证文章,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是当初唯一的一部有系统的较全面的专著,后来虽然有人认为他的写法主要是介绍了众多的作家与作品,通过这些小说的描绘,能够体现晚清社会史料的价值,起了一部概论的作用,不能说是一部小说史,我则认为阿英很早就为近代文学特别是晚清小说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而且在解放后仍努力不懈,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这两套大型资料系列丛书,还编录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晚清戏曲小说书目》等资料参考用书,贡献颇大。郑

振铎不但写过研究与介绍近代文学有分量的文章，他于一九三六年编了 部《晚清文选》，选收了自林则徐、魏源至林纾、严复、王国维等一百二十多人的文章，列入《世界文库》之内，这在当初热点集中于近代小说一门而忽略冷落近代散文作品的时候，起了扩大领域展开视野的重要作用。所以建国前三十年研究近代文学的开始阶段，总的来说，还十分薄弱，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仍然如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但当初那些破土垦荒的开路先锋，特别是鲁迅、胡适、阿英、郑振铎这几位成绩卓越的先驱者，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以来，至今又有四十多年了。这期间近代文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十七年；二是十年动乱时期；三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直至如今。其中十年动乱时期，打倒一切，全面否定，研究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可作别论。此后便是研究近代文学的再生、复兴和日益趋向繁盛的时期，目前犹在不停地向前进展。我们回顾建国初期的十七年中，研究近代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学术界空前地重视了近代文学，将它正式认定为一门专业学科，提倡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作为研究近代文学的主导思想。这些都是大家乐于接受，应该肯定的。然而由于认识不足以及别的一些原因，却产生过一种不应有的偏向。那就是在任何领域内都要突出政治，研究近代文学也要为当前的政治需要服务。于是对于近代作家，往往不是从其作品的历史客观实际与当时的社会作用来加以分析研究，而从他的阶级出身、本人成分或政治立场来评论他的文学成果；对于近代作品，往往不是密切地结合思想与艺术两者来加以分析研究，而是片面地强调其思想性，忽视甚至无视其艺术性。比如有些论著不切

实际地过分颂扬太平天国文学,究其原因,无非是对农民起义,只能肯定赞美,否则就是给被剥削阶级抹黑,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世界观与政治立场有问题。又如对于晚清的谴责小说,有些论著认为“这种暴露,也只能是把读者引导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改良主义的文学当然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用这样的公式一套,那末谴责小说便成了抵制和反对革命的毒草了。而且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愈高,反动的政治性便愈强,毒素便愈大,这个调子到了“文革”时期,更加恶性发展了。所以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个教训。

我是“五四”以后成长的人,本来爱好的是现代文学,但在五十年代末期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受命去做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填空补缺的工作,便开始编起五种资料书来,其中四种是属于近代的,另一种虽说是现代的,而它的早期也在近代。也许因此之故,“文革”后举行的历次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都邀我参加,日本创办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刊物也来约我写稿,以至主编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的任务又落在我的肩上。其实我对近代文学没有什么研究,况且所编的几种资料偏于小说方面,那部和近代文学有关的辞典和这部集子的编成,又全仗他人襄助。因而这里我能谈谈的,只不过是自已編集近代文学资料一点有限的经验与肤浅的体会。

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殿尾的第二十八篇内,将名目众多,品种繁杂的晚清小说,高度概括出最为突出最有价值的四位代表作家及其四部代表作品,名之曰“谴责小说”,那就是李伯元及

其《官场现形记》、吴趼人及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曾朴及其《孽海花》。自民国以来,很多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大多没有写到近代,但凡是写到清末小说的,几乎全都遵照了鲁迅这一权威性的精确论断。三十年代阿英写《晚清小说史》,也认为众多的各类晚清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不能不推这四位小说家,他只不过想将四部代表作品中的《官场现形记》,更换为李伯元的另一部谴责小说《文明小史》而已。可就是阿英这么一点小小的修正意见,后来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近代不像现代那么逼在面前,难以冷静地回顾;近代又不像古代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特别是清末小说里写的故事,是我祖父一辈以及父辈童年时代亲历的见闻,这使我感到亲切,很能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我的步入近代文学之门,是从小说开始的。五十年代末我首先着手收集的资料,便是这四位小说家及其作品的各种文字材料。在具体探索资料的过程中,我发觉这四人有两种区别:李伯元和吴趼人除各自的代表作之外,还写了其他多部小说,如李有《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等,吴有《恨海》、《劫余灰》、《九命奇冤》等,而且这几部也是他们的重要作品。而《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既是刘鹗和曾朴的代表作,又是他们各自写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说。虽然曾朴后来写了《鲁男子》,但那已在民国时代,不属于晚清小说的范畴了。

李伯元和吴趼人两人都长期在上海编小报写小说,并依此谋生,可以说是职业文人;刘鹗和曾朴两人各有亦官亦商的身分,别有营生,当初写小说不过是兴到为之,犹如当今的业余作者。因此我将他们四人的资料分别编集成册,根据“内容决定形

式”的原则,李、吴两本便以其本人为中心,刘、曾两本则以其代表作为中心。

收集资料约花了两年多时间,六十年代初先出版了《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的两本资料,吴趼人的一本资料刚编好,正要编李伯元的一本资料时,不幸,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横扫一切,连这些民国以前的资料也都未能幸免,遭受了十多年的厄运。经过动乱,幸亏原先编成的稿件与未编的素材得以保存,于是我赶紧将李伯元的一本资料编成,在八十年代初连同吴趼人的一本资料又一起出版了。

因为这四本资料的前三种和后一种编成的时间相隔了二十年之久,我的编辑方法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一贯认为正确、完备、客观是编资料的三大要素,尤其要注重第一手材料,避免重复与繁琐,力求简洁完美。然而如何才能贯彻这样的主张,还得取决于素材的收罗是否充分和编者认识水平与取舍能力的高低。我编前三本资料时,特别强调反映客观真实,惟恐掺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只想把资料取舍得当、主次分明地一一摆出来,极少甚至绝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像在绘制地图那样的审慎小心,严格地着眼于地点不缺、方位不错,这就是我编前三本资料时所抱的准则。可是到编第四本资料时,由于受了当时兴起的旅游行业的启发,我就体会到身边有一张精确的导游地图,十分有用、必要,如果还能有一位博学、经验丰富的导游者陪同,由他来指引你从这里走向那里,不致走错路或多走弯路,可以节省时间与精力,收获必然更大。因而我编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就收录了自己新写的几篇心得体会文章,这些文章有辨伪有探佚有考证也有评论,尽管不一定正确完善,甚至难免有主观偏见,然而能起到平面的地图所起不到的作用,对实地考察的